



接地气 促精品 创繁荣
——《民族文学》作家翻译家系列改稿班有感 石一宁

探求彝族文学的发展之路

——第二届金沙江彝族文学笔会暨阿库乌雾诗歌研讨会举行

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更好地引导与实现彝族文学发展,推动彝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由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金沙江彝族文学笔会暨彝族诗人阿库乌雾诗歌研讨会8月15日至18日在攀枝花市盐边县召开。与会者围绕“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多民族文学叙述的价值和意义”、“彝族文化艺术研究与批评理论的当代建设”、“阿库乌雾诗歌的文化精神与审美特征”等问题展开研讨。

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地看待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如何让它们能够持续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要以或者会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对叙述者又有何要求?这一系列问题,可谓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文化领域的焦点之一。在研讨会上,多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作了积极回应。

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因其独特而凸显自身的价值,所以应该去尊重它,去完整地呈现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避免把民族文化“本质化、绝对化”的思维,不应该认为某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一定优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不利于民族团结。实际上,尊重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保持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在实践中辩证地把握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从当前的全球化背景出发,提出需要对以中心存在为假设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二元对立思维进行反思。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其本身也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这就要求在文学创作中,摒弃全球化的同时,又需具备全球视野,不走向世界为本质,而是要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即使来自“小地方”、“小民族”,用“小语言”进行写作,作家依然可以写出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作品。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重点分析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写作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汉语创作不仅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渠道,为少数民族文化话语权的表达提供了重要载体,亦规避了民族文学自我审视的窠臼,在借鉴汉语思维、与西方文学审美价值进行交流中,能更好地推进自我全球化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五昌从“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地方性与世界性”、“个人创作与中国经验的表达”等角度来阐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他认为,在多元化中,边缘有时候意味着中心。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时不能受个人民族身份与个人狭窄圈子的限制,既要彰显民族经验,又要抒写中国经验,还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只有将少数民族经验与中国经验相结合,并进行世界性表达才能拓宽创作视野,扩大传播范围。

四川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殷世江从“区域性”、“民族性”

和“历史性”3个角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征。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区域性特点,考虑到民族地区和中华民族的大环境,大而言之是中华民族文学,小而言之是某某民族的文学。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命根子,没有民族的特点,没有民族的精神,就没有民族的文学。另外,历史性是文学的脉络,没有脉络,文学就没有生命力。文学是入学,民族文学的最终落脚点也应该是人。

面对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大语境,彝族文学、文化该如何继续进行发展?对其当代批评理论的建设又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与使命呢?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曹万生认为,四川的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就彝族的诗歌创作而言,就有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一些知名的诗人,一批“80后”彝族诗人也在迅速崛起,构成了一个彝族文学的群星图。对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彝族作家,批评家应该从多个维度加以深入研究,并积极推动年轻彝族作家的成长,促进彝族文学更加繁荣。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郭中朝在发言中总结了10年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彝族文学取得的突出成绩,并提出,四川省作协将继续通过奖项设置、鼓励各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加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与宣传、加强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等措施与途径,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要始终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弘扬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主题,自觉以生活为源泉,把社会当课堂,拜群众为老师。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罗庆春,即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则谈及了彝族文学的地域性问题。他认为,每一种文学都与其地域有着特殊的关联,地域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民族文学是地域文学的集中体现。彝族关于地域性的认知,作家们都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彝族文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域美学。他谈到,彝族的文学、文化自古以来就与古老的金沙江结下不解之缘。相信在未来彝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彝族文学的创造与传播进程中,金沙江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地域标志和民族精神象征。

彝族诗人吉木狼格认为,彝语是促使彝族作家进行创作的真正源泉。虽然很多彝族作家都用汉语写作,但却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彝语。正是彝语源源不断地为他们的汉语诗歌创作提供灵感。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彝语为汉语的创作与表达提供了哪些有意义的东西。

民族文学的传播缺少了翻译这一环节。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文培红认为,民族文学作品要得到其他民族,甚至其他国家的关注,翻译工作至为关键。大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被淹没,没有被发掘、翻译出来,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加强多方合作,做好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推进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

这些年来,阿库乌雾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来促进彝族文学、文化的发展,并通过自己的诗歌、散文等方面的创作,提升了彝族文学的影响力。与会者从不同维度对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分析。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邓时忠用“母语”、“神性”及“人类”3个关键词来概括阿库乌雾的创作。他认为,母语是诗人阿库乌雾的存在之本、生存之根。他坚持用母语创作,是用自己的行动在延续母语的生命。他的作品中具有神性,这种神性是内在的、自然流露的原始神秘感,是与自然亲近的结果,是彝族人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表现。另外,阿库乌雾把眼光投向人类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表现出与世界对话的姿态。他试图超越自身民族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自觉地进行反思。出于人类意识,他走出彝乡,关注印第安保留地、黑人及苗人文化中心、与印第安长老、黑人作家进行交流,汲取人类共同的文学和文化经验。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黄玲谈到,阿库乌雾不仅用彝语、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还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与文化发展等层面对彝族文学进行理论探讨,对拓展诗歌创作视野、完善彝族文学理论研究、加强彝族母语诗歌传播、推进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北方民族大学教授李小说,阿库乌雾一直以来都在为彝族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振臂疾呼、奔走呼喊。他坚持用母语进行写作,并试图以此来唤醒同胞们的母语意识和文化情感,这非常难得。

苗族诗人何小竹从诗歌的节奏感与诗歌的翻译、传播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对阿库乌雾诗作的理解。他认为,在文字艺术里,诗歌与音乐最接近。一首诗,可以让人感知到什么内容,但是仅通过声音、节奏、呼吸就能够感受到诗歌的情绪或者品质。阿库乌雾的诗作,朗诵起来便是如此。他的诗并不是一首都是招魂式——把自己扮成巫师或者神一样的代言人,而是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每一类型的诗作朗诵起来都有不同的感觉。

彝族诗人俄狄小丰则注意到了阿库乌雾诗歌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他说,阿库乌雾诗作中的忧患意识,让他读了之后,学会跳出自己的情感小圈子,寻求文学创作的突围。《金沙江文艺》主编刘存荣提出,彝族文学还有很大的空白地,需要更多的彝族作家、诗人坚持创作,促进彝族文学的持续发展。

阿库乌雾在听完与会者的发言后说:“作为一个诗人,我知道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把我的‘第一母语’彝语和我的‘第二母语’汉语来创作文学作品。几十年来,我努力做到彝语和汉语之间来去无牵挂。此次笔会将我的诗歌创作作为研讨的主题之一,我一方面感到自豪,一方面也感到局促和不安。无论批评,无论褒扬,都需要足够的定力来承受和消化。”

(黄尚恩 田级会)

如何抒写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困境

——当代阿昌族作家访谈



除了上一期(少数民族文艺专刊2013年第8期)推出的孙家林、杨叶生、罗汉、曹明强4位作家,阿昌族还有很多的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比如曹先强、孙宝廷、孙家林、赵家福,他们在工作之余积极写作,为繁荣阿昌族文学尽自己的一份力。本期推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他们4人的采访。

记者: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曹先强:1978年,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在《德宏团结报》上发表了关于小说《香港漂流记》的读后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我到现在对它都感到非常珍惜。到了大学,写作上很积极,在《孔雀》等杂志发表了文章。后来就到电视台工作,常常要为各种节目策划、撰稿,这些文字虽然不是“纯文学”,但是也和文学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文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写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还写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我总是勇敢地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的散文《故乡那高高的枯枣树》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最近在写系列短篇小说《远山的童话》,把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加以提炼,以记录民族的点滴变化。

孙宝廷:我1985年当兵,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乡妹》,写的是一个乡妹子爱上当兵人的故事,发表在成都军区的一个机关报纸《战旗报》上。刚开始主要写的是小说,后来觉得要把小说写得好首先要练好基本功,所以就写散文。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月亮刀魂》,获得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也喜欢写诗歌,认为用诗歌来表达年轻时代的爱情可能会比较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歌这种形式对我的吸引力在减小。

孙家林:我从1978年开始写作。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慢慢培养起了自己写作的兴趣。当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些阿昌族民歌,但我觉得,很多作品都不是阿昌族作家写的,而是其他民族的作家根据阿昌人的口吻“伪造”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作品,于是就动手写一些东西。我记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诗《园丁的心》。后来陆续地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再后来,就转向民间文学和民族史学的研究,文学创作相对少了。

赵家福:我从中学时就对文学感兴趣,但真正写作是在大学期间。虽然我读的是医学,但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开始写作。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在学校的校报上。现在看来,这篇作品的思想很简单,就是平时自己的一些小感受。但就是这些小作品不断地支撑着我写下去。我比较喜欢诗歌,对诗感触多一点,自己写的也多是诗。

价值观,比如善恶的观念、真善美的观念,这些教会我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孙宝廷: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从一开始就想写以当兵为题材的故事。那时候还喜欢看莫言、张承志的作品,觉得他们的散文是一种大散文,我还试着模仿那种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赵家福:在创作上,我受到很多作家作品的影响。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我就非常喜欢。他思考的一些东西跟我是有些共通的,他的那种写作方式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通过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曹先强:我觉得,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丢。作家创作应该力求做到每一部作品都有思想、有主张,或者是给读者一种美感。在退休后要是有充足的时间、良好的身体状态,我就要写关于阿昌族的长篇小说,可能是历史类的,也可能是现代的。阿昌族地区和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试图通过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来表现阿昌族的历史和现实。

孙家林:我写的诗歌主要集中在诗集《瀑布》中。我认为同名小诗《瀑布》代表了我的心声,我的性格和我的志向。瀑布从悬崖上义无反顾地飞下来,我也需要有这种精神。我是个性情中人,喜欢通过诗歌来迅速地表达自我。另外,我也写了一些歌词,讲究韵律、节奏,后来有些被谱了曲。我非常关注阿昌族歌曲创作的得与失,我认为很多歌词粗制滥造,没有认真研究民歌的旋律,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赵家福:我写出来的东西读起来比较苦、比较涩,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优雅自如。但是,即使是多年以后,我自己重新去读,仍然会感动。这并不是说,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写出了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感情。阿昌族是一个很弱小的民族,她能够发展到今天,不知走过了多少坎坷路,不知道背负了多少包袱。当我在作品中反映这些的时候,会有一些辛酸的历史和记忆,会有对整个民族发展的忧虑和期盼。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这些东西同样体现在我们身上,并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记者:“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曹先强:我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依附于本民族的文化,很多现成的素材就直接用到我的作品之中。奶奶讲的很多故事,经过加工、整理、美化,就可能变成一篇很好的小说。像民族文学刊登的《远山童话》之《腊八的忏悔》,就是源于我奶奶讲的教育孩子们要讲公德、要尊老爱幼的故事。我只是改了一下人物的名字,人物形象描写再丰满一点,就变成很好的小说了。

我虽然使用汉语写作,但是阿昌族的语言和

思维方式在我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阿昌族的语言对我非常有帮助。我经常用娴熟的汉语来表达阿昌族的思想。我有一篇散文叫《火塘》,其中连着200多个字没有标点,但是朗朗上口,完全能读通。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有意识地借鉴了阿昌族语言的特色。所以,我总觉得少数民族文字更能够凸显作家的写作个性。阿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我们只能通过汉语来书写,但是我们必须保留自己民族的那种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虽然这很困难。

孙宝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多关注本民族的东西,所以就开始从民族服饰入手,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服饰。特别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就没有人来继承了。所以,我正进行一些采风活动,想找老人家聊聊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比如关于“刀”,它代表了阿昌族的精神,与我们民族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觉得要想真正把自己民族的东西完整呈现出来,采用小说这种体裁可能比较合适。所以,我现在准备写一两部长篇小说,以民族大融合为主体的。

孙家林:民歌对我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民歌在形式上相对自由些,中间可以用“衬字”。另外,我比较注重本民族的历史,因为你不懂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不会体会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深沉的。我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花哨,更讲究历史的厚重感。比如,诗作《我赶马走过高高的山梁》抒发的就是对民族沉重的感叹,呼唤我们民族挺起脊梁,走向明天。

另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心理特征、不同的处事方式,这是其他民族难以深入的一种秘密之地。这个区域,本民族作家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并生动地展现出来。但是不一定说,阿昌族作家就只是写阿昌族题材的作品,比如罗汉,他是写军事题材的,但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现阿昌族作家的风采,我觉得这也很好。

赵家福:我的作品大多涉及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所以读者单看我的作品可能看得不太明白,但如果了解了阿昌族的历史和文化,这种心灵的共振就有可能出现。我非常重视阿昌族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浓缩了阿昌族人对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思考。我诗作中的一些句子、名词、传说、故事都和这部史诗有关。

(采访者:杨春、钟进文、李鹏、宋明霞、王硕、胡艳红、杨金超、张楠、孔琳琳、姜可欣、王亚楠)